

英美文学文库

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牛津英国文学史



Vol.8 | 1830–1880

The Victorians

维多利亚人

Philip Davi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英美文学文库

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牛津英国文学史



Vol.8 | 1830–1880

The Victorians

维多利亚人

Philip Davi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京权图字：01 - 2007 - 2757

This edition of 1830-1880: The Victorians is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sale in Mainland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e. excluding the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Macau, Taiwan) only and not for export therefrom.

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 Philip Davis 2002

'Oxford Literary History series' is the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多利亚人 = 1830 - 1880: The Victorians / 戴维斯(Davis, P.)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5
(英美文学文库. 牛津英国文学史)
ISBN 978 - 7 - 5600 - 6647 - 9

I. 维… II. 戴… III. 文学史—英国—1830—1880—英文
IV. I56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2876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项目负责: 姚 虹

责任编辑: 唐 辉

封面设计: 牛茜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41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00 - 6647 - 9

定 价: 57.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专 家 委 员 会

主 任 钱 青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宁	王守仁	王逢振	区 钊
毛思慧	石 坚	申 丹	宁一中
吕大年	朱 刚	刘建华	刘象愚
刘意青	阮 炜	苏耕欣	杜瑞清
李公昭	李文俊	杨仁敬	肖明翰
吴 冰	何其莘	张子清	张在新
张 冲	张伯香	张 剑	张 耘
陆建德	金 莉	周小仪	胡家峦
侯毅凌	姚乃强	殷企平	郭棲庆
陶 洁	黄 梅	戚 宁	董衡巽
韩敏中	程锡麟	虞建华	

General Prefac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global culture is the arrival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FLTRP is to be congratulated for its imagination and foresight in making these crucial texts available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literature throughout China. There is arguably no greater force in producing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s than the transmission of literary traditions—the great heritage of narrative, lyric, and prose forms that give cultures their distinctive character.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stand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se transmissions. It is the body of writing that reflects on what a literature has meant to a culture. It investigates the moral, political, and experiential dimensions of literary traditions, linking form to content, literature to history, the sensuous love of literature to analytic understan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these important texts will greatly help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become acquainted with recent criticism and major critical theories and movements.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series will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ry education of China, increasing literacy in new fields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extraordinarily timely venture, at a time when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y in a global contex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professionals, and beyond that, for a general readership that seek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W. J. T. Mitchell

Gaylord Donnelley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English and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Editor, Critical Inquiry

出版说明

近年来,许多大专院校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了英美文学课程,市场上也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原版英美文学经典著作,它们基本上满足了高校对课堂阅读教材的需要。但是,英美文学教学中仍然严重缺少原版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工具书等重要参考书,以至于许多学生写论文时收集资料成为一大难题,专业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业务水平的提高因此受到限制,在知识更新及学术研究上也难以与国际接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尤为如此。

据此,外研社组织了全国17所著名高校或研究院的44名英美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经过仔细斟酌,决定引进一批与教学需要相适应,有学术价值,在国外最常用且被国际公认为优秀的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工具书。这是一套开放型的系列图书,以原版加中文序言的形式分批出版。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定可缓解国内大专院校中英美文学参考书匮乏的现象;同时,通过这种途径,可以有意识地引进国际知名学者的代表作,这无疑会推动和提高我国在英美文学领域的研究水平。

钱 青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维多利亚人》(2002年),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为新世纪策划的十三卷英国文学史系列中的第8卷,也是最早出版的分卷之一。作者菲利普·戴维斯现任英国利物浦大学英文教授,在写作和出版《维多利亚人》的时期,他是利物浦大学的高级讲师。

读者在阅读这部1830-1880年的英国文学史¹之前,可能已经凭过去的阅读经验形成了一些期待,比如想看戴维斯如何论英国著名作家,对现实主义是什么看法等等;熟悉20世纪后半叶文学和批评理论的读者还会期待看到在不同理论视角下对维多利亚文学的新认识。确实,“文学史”的写作一般遵循年代顺序,并兼顾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类区分,大作家“排队”论述,重要流派得到一定量的介绍。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史,一般比较突出“时代”影响,会用不长的篇幅进行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情况的综述。然而,所有这些期待在我们还没有翻开这部文学史之前,就已经开始打破了。标题是《维多利亚人》——为什么不是维多利亚文学/文学家?目录(Contents)让人无所适从,哪里是时代背景?哪里去找勃朗特?哈代?诗人呢?目录中提到名字的人一共只有12个,有4个重要小说家,3个次要小说家,其余是散文家。对英国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散文家其实可归入许多名目: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神学家,传记家,经济学家,科学家,书信、随笔名家等等;然而在这些名字中,我们找不到卡莱尔,阿诺德,纽曼,可达尔文却在目录中出现两次(从窄义的“散文”看,达尔文的成就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以上3位)。无论在目录中提到否,我们在正文中很难找到一个作家生平的简要而系统的介绍,更缺乏其全部作品的罗列和内容简介(国内出版的外国文学史,作品简介往往占了很大篇幅;对于不读文本而教授

1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多年(1837-1901),文学分期上一般将维多利亚文学的起端定在1830或1832年,而70年的发展又分成3段,动荡的早期和国力鼎盛的中期作为一段讨论,下线在1870-1880年间,此后的社会和价值都发生较大变化,往往单独讨论。戴维斯在序言中解释了他确定时间上下线的理由(3、6页)。

文学史的教员来说,《维多利亚人》很难用来制作成教案)。尽管如此,当我们阅读这部断代文学史的时候,却发现卡莱尔、阿诺德等人几乎出现在所有章节,即使狄更斯、乔治·爱略特、特洛罗普等被目录标出的小说家,也远不是安分地呆在某个章节,而是活跃在全书中。远在作者涉及专门的小说、散文、诗歌类别之前,小说家、诗人和文人及其作品和言论就频频地甚至大段地出现在其他问题的论述中,所有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创作,都与时代的思想知识氛围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地盘不是缩小了,而是更扩大了)。事实上,《维多利亚人》并不受文类、时段等概念的规约,书中出现大量不为读者熟悉的名字和他们所留下的文字记录,重大主题(如写实主义,达尔文影响)在各章各节中不断回环;时间上,叙述不仅不断打破年代顺序,还不断冒出1830至1880年的时段,往往同一页上提到的年代来回跳跃;这些对于对维多利亚文学有兴趣但涉猎不深的读者尤其会发生困难。简而言之,这些很浅表的观感提醒读者,这是一本别样的文学史,它关注的不仅是窄义的文学家和文学“文本”(texts),而更是我们可以称为文学文本所置身其间的历史社会“语境”(context)。

有些困难是比较好解决的。在图书资讯和网络极其发达的今天,有很多途径都可帮助提供诸如作家生平、作品内容提要、文学类型描述等基本信息,2005年出版的《牛津英国文学词典》第6版就是一部上佳的工具书。至于时序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套新文学史的前身是在20世纪下半叶几十年间出版的15卷《牛津英国文学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其中第13、14卷分别是《维多利亚小说》(1832-1880)和除小说外的《维多利亚诗歌、戏剧和各类散文》(1832-1890),第13卷有“年表”附录(419-447页),比较详细地按年列出1832-1880年间的历史事件,文学史大事,开始连载的小说,出版的诗歌、散文和戏剧,有利于我们把握50年间的时代线索。还必须提一下《维多利亚人》的附录和索引。正文后的“作家书目”有59位维多利亚作家的简介,在与创作有关的生平述要之后,介绍了几种可靠版本(全集,选集),作家书信集,可靠传记,可靠的评论研究著述。¹对于想进一步深入了解维多利亚文学的读者,按主题排列的“建议阅读书目”(Suggestions

1 版本、传记的“可靠”对于研究工作十分重要,我国的学习、研究者一般使用单行本小说比较多,而市场上有各种纸面本,其中比较可靠的版本是牛津世界名著丛书(Oxford World's Classics)和企鹅名著丛书(Penguin Classics);此外,美国的诺顿评注版(Norton Critical Editions)和河边出版社的版本(Riverside Editions)等也都是很好的。

for Further Reading)会有很大帮助,绝大多数是近三十多年来的研究著述,有的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剑桥大学教授比尔(Gillian Beer)的《达尔文情节》(*Darwin's Plots*, 1983)可以说为研究达尔文和科学与小说的关系开拓了很大的领域。书的“索引”做得很好,重要作家的索引条目下还有细目的提示,读者可充分利用。例如,若对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感兴趣,在索引中很容易找到集中论述该作品的页码提示(318-323页)。不仅作家和作品,想了解19世纪的重要思想概念,也可充分利用索引,例如“不可知论”(Agnosticism)可先找到57-58、100-102页的集中叙述。

《维多利亚人》虽不同于一般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却仍有相对清晰的组织原则。正文11章,可以笼统理解为由“时代背景”和“作家作品”两大部分构成,只是前5章“背景”不同寻常地占了几乎全书一半的篇幅,其线索不是年代或事件,而是对整个社会和思想观念产生深远影响的若干“主题”:1.“从乡村到城市”(社会经济的巨变,工业化,民主政治,知识界的认识);2.“自然”(达尔文和科学革命对世界观的冲击及知识界的应对);3.“宗教”(信仰危机,三大教会,自由主义影响,不从国教派及福音教);4.“心智”(现代脑科学和心理学初创阶段);5.“文学生产的条件”(作为产业的文化,图书杂志和报业市场)。后6章则按“文类”划分:戏剧(第6章),小说(第7-9章),各类散文(第10章),诗歌(第11章)。“结论”部分更像前瞻,用梅瑞狄斯和哈代的作品分别代表50年文学的走向或“落点”,当然也是进一步提升全书,讨论一些作者眼中的最根本性的问题——信仰,价值,以及对表达方式的孜孜追寻。

牛津文学史坚持采用一个作者写一个断代的策略,《维多利亚人》所用史料之广泛和丰富,见解之独到,很难令人相信这只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著作,并因此得到书评界的广泛好评。确实,它不只是文学史,而已经接近了通论维多利亚社会历史文化的专著。为了更有准备地进入这部作品,我们不妨从过渡性的第5章开始阅读。

第5章第1节“文学职业,图书业与文化”尤其值得注意。这部文学史似乎终于在200页后提到了“文学”(尽管如前所说,在前200页中,文学创作者始终作为社会和知识界成员在各种主题中受到密切关注),然而这一节给我们的仍然是宏阔的画面:“无论哪个领域,主导的倾向都是巨大的累进的扩张。”(209页)50年间英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民主政治的步步推进,中产阶级力量的迅速壮大,其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日益自觉和焦虑,劳动大众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崛起,其改善自身文化状况和保持

独立思想的愿望和意识，与这些发展形成互动关系的各类公共政策的出台——凡此种种，都被收纳进来，在文化形成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的平台上予以审视。

我国的外国文学教材，往往在“背景”部分勾勒出大局面，大事件，似乎这些与作家作品自然会发生关系。但第5章告诉我们，文学事业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生产，精神产品与十分物质化的生产链条以及操纵此链的种种力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的眼界是宏阔的，但叙述和分析的视角却微观、具体、细致：《维多利亚人》的这些显著特征充分体现在第5章对大大扩张了的表达空间的叙述。就以公共政策来说，一般文学史都会提到政府降低、取消报纸印花税和纸张税，促成了报纸图书业的巨大发展；但戴维斯还提到1851年废止“窗户税”的政策，这也是《泰晤士报》所称的“知识纳税”的一种，取消意味着使国内七分之一的房子增加了户内光照，大大有助于阅读大众的形成（202、208页）。看似只是增加了一条信息，其效果却让读者切实感受到在没有电灯、一切蜡烛（油脂的、蜡制的）都要抽税的年代中，自然光照对于阅读有多么重要，而阅读大众的形成是图书杂志市场形成的重要条件。初级教育的普及也使更多做工的人参与了阅读大军，出版界不断推出面向社会下层的廉价普及读物与自学教材（206-207页）。尤其有意思的是有关英国文学进入教育体系的描述：1871年英国本土文学被纳入小学教学计划（217-219页），1859年从伦敦大学开始了英国文学学科化的漫长过程（220页）；阿诺德等人坚持的思想在维多利亚社会功利务实的大潮中仍能牢牢扎根，这个事实本身就发人深省。戴维斯的这种现代史学关注特殊性，关注具体的叙述方法，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印刷业、报业、出版业、大众阅读、（普及）教育、政府政策、政治和自我意识的提高之间的互动关系，看到许多事情之间的互相关联。

统计数字看似抽象，也不见得确切，但可帮助我们落实或者纠正一些原有的印象，例如词义含混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在我国通常使用“资产阶级”一词）。戴维斯对此社会中间段的人口比例、收入、具体职业等方面的界定等均有动态的数字为支撑，使这个具有很大包容性、模糊性的词清晰起来（202-203页）。如果说，收入100-300英镑左右的人占20%，其下是非熟练工的劳工大众，其上有大的工商、金融资本家，高端的专业人士，那么，我们熟悉的一些小说家处于什么经济地位呢？戴维斯采用1868年出版的《国民收入》中的数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年入1000-5000英镑的人数不足千分之三，又列举购置各类房产所需钱数，使当今读者对那时的货币购买力心中大致有数。有了这些基准参照，看特洛罗普和乔治·爱略特等在奋斗多年、业已成名后的版税收入，毫无疑问，他们已经跻身社会上少数的高收入人群（199-200页）。

这也说明，到了19世纪中期，仅依靠写作不仅可以维持生计，甚至还可以生活得很不错。另据估算，作家中77%来自中产阶级家庭（210-211页）。

虽然经济状况和数字都无法从根本上说明作家的想象力特质，但文学想象的模式仍与特定语境有关。维多利亚中后期，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图书“市场”形成，使一大批作家能够单纯依靠写作为生。据统计，至1888年曾有14,000个职业写作者，其中有很大的比例在为日益繁荣的杂志业和报业写作（维多利亚时期产生过25,000种报纸，213页），而无须依靠任何别的机构或贵人的赞助，典型的如乔治·爱略特的伴侣刘易斯（211页）。至于小说，这个时期产生的小说总数有不同估算，戴维斯用了比较保守的数字4万（11页），小说家至少有成千上万。无疑，其中绝大多数人的作品今天我们已经不读了，有一部分通常被列在“次要作家”、“通俗作家”或各种亚门类之下（能被如此提名的至多几十人而已），然而有些人的名字在他们写作的年代也是响当当的。中国读者可能对奥列芬太太比较陌生，她自年轻守寡后，靠写作养活了几个子女，还抚养了不争气的兄弟们及他们的家庭，过着几乎是奢华的生活，儿子、侄子上的是伊顿公学；然而，似乎总在人前掩饰自己在从事职业写作的她却在一生中出版了100部奥斯汀风格的写实小说，数百篇杂志评论文（197-201页）。这样的作家当时并非少数，如今仍知名的作家，其作品总量反而不大。作家的“大小”，或说重要性的排位从来不是固定的，只是相对的。《维多利亚人》并不刻意区分大作家、次要作家和其他广大写作者，在第5章和以后各章中，我们看到的是重要作家生活和写作的具体语境，他们与其他作家共享的许多思想、思虑、主题、表达方式和意象，并探讨他们做得更好的地方及原因。

上述语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所有作者都面临的市场环境。事实上，这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热门研究课题。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在我国的维多利亚小说研究中不怎么受到重视的一点，即出版形式和价格制度，尤其是经营租书业务的穆迪流通图书馆（Mudie's, 208页）。营利性图书馆18世纪就有，但到19世纪中叶，穆迪把事业做大了，他以类似于今天付年费入会的方式争取到大量读者，又因此能大批量低价购入图书；快速流通对出版商有很大吸引力，为了生意周转他们就会有意无意地服从穆迪那十分清教式的趣味和标准；这种标准又因穆迪精明的借阅方式或曰生意策略而影响了在福音教气氛浓厚的社会中的广大读者，进一步培植起所谓的维多利亚价值观，并说明为何最昂贵的传统三卷本小说在杂志报纸连载和分册出版已成风气的年代，居然经久不衰。

1 萨瑟兰（John Sutherland）在《朗文维多利亚小说指南》（*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Victorian Fiction*）中说维多利亚时期总共出版过6万部小说，有7,000位小说作者。

(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三卷式出版才随着穆迪租书业的消弭而戛然中止)。从小说家的方面来说,如试图突破陈规,探索幽微,势必会面临以穆迪为代表的社会接受尺度的制约,故 1850 年后的维多利亚小说很少正面表现情欲和激情。三卷本、杂志和报纸连载等这些通行的出版形式,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小说创作的形式(如悬念、高潮的安排)以及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与穆迪的作用相应的大流通渠道,还有史密斯在铁路沿线建立的书报销售网络(208 页)。

维多利亚时代由市场操控的巨大表达空间意味着每天有大量文字被书写、发表、阅读、遗忘,意味着人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当下的日常生活、思想、意见、情绪,意味着直白易懂的散文必然成为主要的书写、发表形式,也必然拥有最大量的读者,其中多为新加入的中下阶层读者。散文体小说尤其和“连载”形式的盛行有特殊关联(可在索引 serialization 条中找相应页码):时间嗖嗖地向前直行(维多利亚“进步”观念的直观表现),作家被逼得无喘息之机,这样大量炮制出来的文字是否已经失去了精雕细琢的诗歌的文学意义和价值,而将被时间的洪流冲刷得无影无踪?散文小说是否已成为一种廉价消费品而无法在历史中沉淀下来,流传下去,获得永恒的生命?在第 2 节“散文的上升”中,戴维斯将重点转移到论述散文的是与非。这不仅是小说家面临的课题,也是维多利亚知识界的重大课题。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若把穆迪的清教标准、为生活写作、连载的压力等种种因素都看作是一种文化体制的形成及其造成的制约和束缚,那么戴维斯在第一节结束前即点出了这一“挑战”的实质意义:知性作家正是“在体制的约束中写作,以超越体制;在匆匆向前不驻留的时间中寻找意义,以超越稍纵即逝的片刻;在书的形式内寻求抵达书外的真实生活,亦即其主旨和题材;在中产阶级内部写作,以挣脱阶级的束缚……针对纯粹的职业化写作,造就一个崇尚人的价值的职业,在市场化社会的中心造就非资本主义的机构和力量,以改造市场社会,逼近不受专门利益束缚的英语语言的全部领域和纵深处。”(220—221 页)超越,这是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提出的思想。可以说,优秀作家就是那些体现超越性的作家,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以自己具有前瞻性的创作影响国民意识和国民气质,才能传诸后世,至今仍给我们以巨大启示。

戴维斯的这部断代文学史,也以自己的方式超越了以往的维多利亚文学史。它最大的特色、对我们最有启示的,应是包括第 5 章在内的前半部。它切入一个历史的断层,宏观的视野与细微、具体、多重的观察视角相结合,从不

同的立场理解各种意见，不简单化地下断语；为此戴维斯频频使用对比、比较的方法。如在“宗教”部分，他分别叙述了低教会和存在于国教之外、反智的福音教各派，理性的广教会，以及一般认为是高教会的牛津运动，然后比较了牛津运动和福音教的共同之处，得出了“牛津运动纠正并再造了福音教”的结论（尤见116-120页），这显然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果，对我们认识维多利亚社会极其复杂的宗教问题提供了又一个视角。甚至同一个人，也可以主持两件几乎完全相反的事情，而自己却浑然不觉其中的矛盾。何以至此？在1834年贫民法出台的问题上（43-45页），戴维斯的叙述完全没有流于形式地批判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而是将笔锋直接探进了社会无意识的层面。事实上，全面的比较不仅体现在重大主题部分，也同样是戴维斯在后半部中描述戏剧、小说、散文、诗歌等“文类”的方法。例如，我们已经提到，他并不清晰区分重要、次要小说家；相反，他用很长的篇幅叙写布尔沃-利顿（Bulwer-Lytton，第7章）作为比照，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狄更斯和萨克雷的贡献，而狄、萨二人的形象也是在比较中凸现的。狄更斯那特殊的活跃想象力，他所关注的社会阶层，他处理线性的“连载”和思考空间之关系的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参照，帮助我们理解和评价或以奇幻、惊悚或以写实为特征的其他作家和作品。与时下种种将《呼啸山庄》压回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做法相反，戴维斯充分认可艾米莉·勃朗特这部小说的奇特性，并由此进入柯林斯（Wilkie Collins）、布雷登（Mary Elizabeth Braddon）、卡罗尔（Lewis Carroll）和麦克唐纳（George McDonald）等作家（第8章），慷慨地给予那些并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的作家作品以应有的地位。可以说，只有充分认识维多利亚小说创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作为那个时代中文学的标志性成就——写实主义小说，更毋庸说所谓写实和非写实作品在不少方面仍是互相渗透的。盖斯凯尔夫人的地位近年来稳步上升，在《维多利亚人》各章我们都能看到她的身影；戴维斯几乎将她和特洛罗普作为维多利亚写实小说的标准参照，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比较中更深刻地认识乔治·爱略特对写实主义的独特贡献。甚至“诗歌”部分也与小说，尤其写实小说形成对照关系。

与对照、比较相关的另一大特色是他对19世纪文字记录的大量运用，这可能对我国广大读者造成比较大的困难。在叙述层面，他似乎旨在将读者“拉回”到维多利亚时代，让我们聆听当时的人叙说他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让我们切实感受到激烈争论的气氛。难能可贵的是，文中的引述大量基于他对第一手资料的研读和思考，虽说他对近几十年优秀研究成果的吸纳亦时而清晰可见（参看他的脚注及附录中的书目）。一本21世纪初的书，企图回到19世纪的感

觉中去，是否白费心机呢？不然。戴维斯似乎从不愿意简单利用几个当代理论的标签，他试图让我们重新回到“原点”——那尚不存在21世纪人的“后见之明”、却不乏进逼真知的勇气和切实寻求解决问题办法的智慧的时代。如果戴维斯为他的叙述找到了支撑点的话，那么这个支点可以用前一、二章中频频出现的一个关键词来表述，synthesis——整合。当眼前出现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新现象，当过去的经验被阻断，原有的认识系统不能对新形势做出合理解释时，维多利亚人——维多利亚的知识分子和优秀文学家并没有因此随波逐流，而是进行了种种驾驭新潮流，建构新的认识体系的努力。但是，戴维斯关注重视角的叙述却不只是体现了历史性思维，它也是对文学性思维的最大肯定。历史上的分歧可能永远是分歧，历史上的人经历的思想矛盾也可能永远没有最终的解决，选择了一个方向（改革、进步）就意味着无法同时选择其对立方面，然而维多利亚的优秀文学因其卓越的想象力而能最大限度地容纳并跨越纷争和对立，成为一片思想、灵性、情感、情绪的保留地（即戴维斯反复使用的“the holding ground”），成为供后来者不断探索的宝地。

不为别的，就为它打破了在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中常见的思维定式，《维多利亚人》也值得一读。

韩敏中

北京大学英语系

维多利亚人

英美文学文库

导 读

General Editor's Preface

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is the twenty-first-century successor to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which appeared in fifteen volumes between 1945 and 1997. As in the previous series, each volume offers an individual scholar's vision of a discrete period of literary history.¹ Each has a distinctive emphasis and structure, determined by its author's considered view of the principal contours of the period. But all the volumes are written in the belief that literary history is a discipline necessary for the revelation of the power of imaginative writing to serve as a mean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ur primary aim is to explore the diverse purposes of literary activity and the varied mental worlds of writers and readers in the past.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institutions in which literary acts take place (educated communities, publishing networks, and so forth), the forms in which literary works are presented (traditions, genres, structural conven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broader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and transformations. Literary history is distinct from political history, but a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cannot be divorced from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revolutions or the effects of social change and the upheaval of war.

We do not seek to offer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works of all 'major', let alone 'minor', writers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All literary histories are inevitably incomplete—as was seen from the rediscovery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f many long-forgotten women writers of earlier eras. Every literary history has to select: in so doing, it reconfigures the 'canon'. We cast our nets very widely and make claims for many works not previously regarded as canonical, but we are fully conscious of our partiality. Detailed case studies are preferred to summary listings.

¹ Since Volume 1, to 1350, covers many centuries, it is co-written by two scholars.

A further aim is to undertake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very notion of a national literary heritage. The word 'literature' is often taken to refer to poems, plays, and novels, but historically a much wider range of writing may properly be considered as 'literary' or as belonging within the realm of what used to be called 'letters'. The boundaries of the literary in general and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in particular have changed through the centuries. Each volume maps those boundaries in the terms of its own period.

For the sake of consistency and feasibility, however, two broad definitions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have been applied. First, save in the polyglot culture of the earliest era, we have confined ourselves to the English language—a body of important work written in Latin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ies has been excluded. And secondly, we have concentrated on works that come from, or bear upon, England. Most of the writing of other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notabl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excluded. We are not offering a world history of writing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hose Americans who lived and worked in England are, however, included.

So too with Scottish, Irish, Welsh writers, and those from countries that were once part of the British Empire: where their work was produced or significantly disseminated in England, they are included. Indeed, such figures are of special importance in many volumes, exactly because their non-English origins often placed them in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with England. Throughout the series,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encounters between English and other traditions. But we have also recognized that Scottish, Welsh, Irish, African, Asian, Australasian, Canadian, and Caribbean literatures all have their own histories, which we have not sought to colonize.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argue endlessly about periodizati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is both traditional and innovative. For instance, the period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long been thought of as the 'Romantic' one; however we may wish to modify the nomenclature, people will go on reading and studying the Lake Poets and the 'Shelley circle'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so it would have been factitious to introduce a volume division at, say, 1810.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still too soon for there to be broad agreement on the

literary-historical shap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propose a single break at, say, 1945 would be to fall in with the false assumption that literature moves strictly in tandem with events. Each volume argues the case for its own period as a period, but at the same time beginning and ending dates are treated flexibly, and in many cases—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re is deliberate and considerable overlap between the temporal boundaries of adjacent volumes.

The voices of the last millennium are so various and vital that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is alway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rewritten. We seek both to chart and to contribute to that rewriting, for the benefit not just of students and scholars but of all serious readers.

Jonathan Bate